

长期“单双号限行”是明显推责行为

□石述思

首先声明我是有车一族。如果反对单双号限行，一定会被一些人扣上为了自己私利，缺乏低碳环保之心的帽子。

这样的指责无助于换来北京持续的蓝天。因为，你忘了汽车工业的另一面：方便出行，扩大生活半径，为GDP和政府第一民生使命——就业做出的贡献。当然，中国的车主还付出了比发达国家更为高昂的购置、使用税费。

也就是说，买车在一定程度上是爱国行为。

另外，如果私家车是雾霾的唯一罪魁的话，我倒建议直接将其在北京取消算了。以前中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自行车王国，恢复起来想必还能降低交通伤亡事故率，酒驾更会销声匿迹，真是利国利民。

此前，北京市暂时施行的机动车单双号政策，成为短暂的APEC蓝一个重要原因，结果不

少人很激动，开始呼吁政府将这一政策常态化。即便是北京推行了购车摇号加行驶限号双重治理措施，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还是加入了有车一族的行列，但总体数量仍无法与无车族比拟，于是，人民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受访群众支持单双号。

此前，在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上，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表示，“建议单双号要成为常态，包括星期六、日，我们将听取和论证这个意见。”

同样在雾霾严重的首都生活，我和广大市民一样，对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危害充满焦虑。不过，仅仅对机动车进行限行，或许对短期缓解路面交通有明显改进，但对于百姓出行未必是福音。

人民网的调查中，数据充满黑色幽默。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当前的公交地铁并不很方便。也就是说，就出行而言，一旦单双号常态化，每天暴增的200多万辆人口根本无法体面顺畅地出行。

在治理拥堵中，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进程，科

学规划、公交先行、科学管理比一味地限制有车族出行权都更切中肯綮。何况，公共问题的解决不能首先建立在普通公众承受治理主要成本之上——哪怕他们叫车主，是少数派。

即使北京市环保部门声称，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是北京市PM2.5本地污染排放最大来源，占比31.1%（本报前天第五版刊出的数据好像不支持这么高的百分比）。但其中黄标车所占比重惊人，如果全面淘汰，再加大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力度，占空气污染比重会迅速下降。

当下，北京治理大气污染集中在聚焦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等四大主业，结合APEC的先进经验，还需要京津冀联动，将这一切建立在迅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成产业升级的基础上。为了保证这一系统工程取得预期成效，当务之急是在稳增长的基础上，将发展的前提牢牢锁定在保护环境的框架下。

如果没有这一前提，盲目地对机动车采取单

双号限行，不仅涉嫌侵害公民正当权益，其背后所指的主流民意也将沦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只会加剧社会不同群体间的裂痕，而无助于大气污染的有效治理和公共利益的维护。

更何况北京当前的汽车保有量，主要是地方政府决策的结果。如果简单地用单双号解决，是政府明显推责行为。

最近，国务院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重点对约束地方政府重发展、轻生态环保的行为提供了更有力的法治依据。

这也在提醒决策者，无论民意多么强悍，目的多么正义，在形成制度的过程中，不仅要科学充分论证，实现程序正义，使公众为此付出的成本降到最低。

我相信，多数车主都是爱自己的城市，珍惜自己健康，有基本的环保意识和觉悟的，只是期待为自己放弃开车找到一个更合法、更公正的理由。

留京还是返乡，要不要户口、编制……当大家纠结于种种此类问题之时，那些执着追求自己梦想的人，已经踏上征程——

青春：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兰德华

2014年临近尾声，而一年一度的校园招聘却正如火如荼展开。我们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需要通过职业融入社会。然而，进银行、进国企、考公务员、考事业单位，不知从何时我们的选择竟如此偏狭？不知何时，我们开始充满怨怒：我们所做的工作不是我们想做的工作，而是我们不得不做的工作？尽管如此，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他们不甘就此被生活束缚、被社会某些刻板观念所羁绊。生活不止一面，青春更不是单向度的，我们的青春该有更多的面向和选择。

“有梦想，青春何处都可安放”

“我常常在想：什么样的生活就证明自己是一个Loser（失败者），我这种没有你们所谓的正式工作又整天瞎忙的人算不算？我想做的事，别人都会惊讶地问我：你一个北师大的研究生不找份好工作，竟然去做微信代购？一开始我在乎，在乎别人的眼光，在乎面子。后来想明白了，只要所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不管成功与否，至少叩问内心，我已战胜了许多！晚安！我是代购皮毛一体雪地靴的，哈哈。”

不久前，在某个深夜，毕业快一年却无心找工作，整天忙于自己代购生意的马海静（化名）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了这段话。这是她同自己的对话，更是对质疑她的人们的回应。

硕士毕业后，令大家大跌眼镜的是，这个研究生期间发表过若干学术文章和拿到过国家奖学金的姑娘居然选择了开网店，做起雪地靴代购生意。

“公务员开始就报没报考，导师推荐的一家研究所也是可以去的，我不是留不到北京。”她说。当毕业时大家挤破脑袋想留在北京的时候，她选择了离开。“我喜欢老家的小县城，这里没有北京的拥挤和喧嚣。”

回家后，父母为她安排了当地的一家国企，然而，她再次选择了放弃。“为了这事，我妈和我吵了好几次。”她说家人和亲友



遥望远方 不失希望

的不解曾有段时间很让她苦恼，特别是他们异样和质疑的眼神，“但我相信自己的选择！”

创业，其实对她来说不是心血来潮。在西北师大上本科的时候，她就曾和朋友一起开火锅店，两年间赚了十几万元。读研究生期间，尽管学业繁忙，但她利用闲暇还是会去学校的跳蚤市场“练摊”，利用学校网络服务平台做团购。

现在，她在家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网店和“微店”上，虽然刚刚开始，但生意还不错。她说，创业一直是她的梦想，也是她兴趣所在，她坚信互联网时代给了年轻人一次人生逆袭的机会，她不想错过。

谈到梦想和青春，她告诉记者：“北京也好，老家也罢，不失梦想，青春何处都可以安放。”

“活着，写作，然后成为生活本身”

黄良宋，本科时是一个地道的工科生，而现在他是独立的影视剧、广告剧作家。他是记者采访的第二位主人公。

(上接第1版)

让患者把电话打过来，是关爱之家一项不成文的规矩。已参与艾滋病治疗十年的孟清告诉记者，刚开始由于没经验，给患者打电话会直接问：“你是谁谁谁吗，我这里是传染病医院……”这样的电话不是被挂断，就是长时间无声。

后来，大家摸索出来，患者非常在意保密。于是，把自己的电话留给患者，让他们选择方便时间。关爱之家的医生都有两部手机——一部自用，另一部专门接听患者电话。即使患者半夜打电话，他们也会接听。

“每接收一位病人，都要先问，他的病情都谁知道。”孟清说，对于一些年轻患者，若他本人不同意，连直系亲属都不能告知。在病房中，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都不会公开说某人是患者，只在工作交流时会提到，“咱们科又来了一位‘小艾’”。

不仅个人信息，就连药也要藏起来。“大夫，给我一个袋子。”听到患者的话，王丽拿出了黑色塑料袋。黑色塑料袋是医生的“标配”，让别人看不到患者用药的外包装。

亲之爱——把患者当亲人

作为医生，卢宁从不会说“艾滋病”三个字，取而代之的是“HIV病毒”。

中国的第一例艾滋病出现在1985年，那时卢宁已进入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工作两年了。1999年，当哈尔滨市出现第一位患者时，卢宁才发现，上学时根本没学过这种病。病人被家属扔在医院，连钱都没交就走了。

“没时间害怕，也没时间犹豫。”卢宁回忆说，所谓害怕那是后怕。病人来时他们做的防护就只有乳胶手套和一次性手术服。“怎么治艾滋病，当时不知道，但我们可以从并发症下手。”经过十天治疗，病人的肺炎、心衰等并发症得到控制。

患者没有家属照顾，医护人员轮流帮他打饭，并把自家旧衣服给他穿。十天治疗后，病人可以自行下地上厕所了。本以为有所恢复的病人回家休养就算完成使命，没想到的是，出院五天后，病人又回来了。

原来，病人所在的村子虽不清楚他得的是什么病，但认为这种病“挨上就死，无法治疗”。村里人把患者家门窗都打死了，全家人跳窗逃了出来。为了不拖累家人，病人又回到医院。十天后，在病痛和心痛之下，病人去世了。

“当时护士长给他擦的全身，帮他穿衣服，我和医务科长把他抬到了太平间。”第一次与艾滋病人的接触让卢宁意识到，这种病绝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我们要站在患者的角度，拿他们当亲人看。”出于这样的考虑，卢宁无论是和患者还是和其他人交流都不会提“艾滋病”，取而代之的是“HIV病毒”。

杨丽云是关爱之家的护士，每当有患者问“我还能活多少年”时，她总会耐心地解答——其实，这位患者每次看到她都问一遍。

“疾病的的压力是一方面，他们心里的痛苦、无处倾诉的痛苦所带来的压力是更大的。”杨丽云记得一位患者，在醉酒高危行为后发现手上有伤口，就怀疑因伤口感染得病。“为了验证是不是得病，他竟然拿刀在手上反复割口，观察结痂时间。”杨丽云至今忘不了患者看到报告单送回科室时，一把抢过去的情景。

目前，在关爱之家接受治疗的年轻患者是一名大一学生，“不知道他们是不懂还是无畏惧，但让我帮着分析，问题可能出在哪儿了。”至于细节到什么程度，杨丽云只是轻轻摇头笑笑。尽管觉得不堪，但杨丽云明白，如果不是心理压力极大，如果不是对活下去的渴望，人是不会这样咨询的。

虽然身处传染病医院，但关爱之家每位医生都不戴口罩。每年他们还会组织一两次大型活动——野游、聚餐，和患者一起吃和玩，从一开始的恐惧、担忧到现在的坦然。

“我要是知道您是这态度，早来了。”一位艾滋病患者就诊时在听了医生十多分钟的“独白”式问诊后，终于说出了一句话。

几乎每位患者，尽管可能最亲密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是病人，但在这里，他们愿和关爱之家的人分享每一份喜怒哀乐。他们会把找

不到工作的苦恼吐槽出来，也会把病毒控制后生下健康宝宝的照片分享给“家人”，甚至，还会厚着脸皮说最近又和谁“激情”了。

杨丽云总会笑对患者的“碎碎念”，她认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很好。孟清则会对那些“激情”不断的“怒目而视”：“你不累啊？能不能消停点儿？”无论是微笑，还是怒目，“家人们”都坦然接受。

痛之爱——年轻面孔令人痛心

艾滋病患者在被确诊之后是什么状态？

第一种是三四十岁的患者，基本都有家室，会感到非常痛苦，首先想到的是对不起老婆孩子。

第二种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或丧偶，或因配偶身体不好，因高危性行为得病，会觉得非常丢人，晚节不保，又给儿女丢脸。

第三种人是所有医生都不愿意看到的，近年来人数逐渐增多的群体——青年人。

数据显示，2013年1月到10月，哈市新增发现艾滋病感染者253例，新增感染者以青壮年人群为主，这其中同性人群已成为第一高发群体。而在同性传播中，年轻、高学历的感染者有增多趋势。

据医生们不完全统计，大多数年轻患者来自单亲家庭。曾经有一位不到20岁的患者，长得白白净净的阳光男孩，很小父母就离婚了。初二时父亲不但不给学费，还到学校把孩子妈妈交的学费要回来。从此，孩子辍学了，“初二辍学，他能去干什么？”至今，孟清都

觉得心痛不已。

王丽医生是今年9月从其它医院调入关爱门诊的，刚接诊时，她说自己快要崩溃了。

几乎每位患者，尽管可能最亲密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是病人，但在这里，他们愿和关爱之家的人分享每一份喜怒哀乐。他们会把找

不到工作的苦恼吐槽出来，也会把病毒控制后生下健康宝宝的照片分享给“家人”，甚至，还会厚着脸皮说最近又和谁“激情”了。

杨丽云总会笑对患者的“碎碎念”，她认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很好。孟清则会对那些“激情”不断的“怒目而视”：“你不累啊？能不能消停点儿？”无论是微笑，还是怒目，“家人们”都坦然接受。

痛之爱——年轻面孔令人痛心

艾滋病患者在被确诊之后是什么状态？

第一种是三四十岁的患者，基本都有家室，会感到非常痛苦，首先想到的是对不起老婆孩子。

第二种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或丧偶，或因配偶身体不好，因高危性行为得病，会觉得非常丢人，晚节不保，又给儿女丢脸。

第三种人是所有医生都不愿意看到的，近年来人数逐渐增多的群体——青年人。

数据显示，2013年1月到10月，哈市新增发现艾滋病感染者253例，新增感染者以青壮年人群为主，这其中同性人群已成为第一高发群体。而在同性传播中，年轻、高学历的感染者有增多趋势。

据医生们不完全统计，大多数年轻患者来自单亲家庭。曾经有一位不到20岁的患者，长得白白净净的阳光男孩，很小父母就离婚了。初二时父亲不但不给学费，还到学校把孩子妈妈交的学费要回来。从此，孩子辍学了，“初二辍学，他能去干什么？”至今，孟清都

觉得心痛不已。

王丽医生是今年9月从其它医院调入关爱门诊的，刚接诊时，她说自己快要崩溃了。

几乎每位患者，尽管可能最亲密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是病人，但在这里，他们愿和关爱之家的人分享每一份喜怒哀乐。他们会把找

不到工作的苦恼吐槽出来，也会把病毒控制后生下健康宝宝的照片分享给“家人”，甚至，还会厚着脸皮说最近又和谁“激情”了。

杨丽云更忘不了给他做咨询时的尴尬场景。

“他把当时高危性行为的每一个细节都讲给我听，并让我帮着分析，问题可能出在哪儿了。”至于细节到什么程度，杨丽云只是轻轻摇头笑笑。尽管觉得不堪，但杨丽云明白，如果不是心理压力极大，如果不是对活下去的渴望，人是不会这样咨询的。

据医生们不完全统计，大多数年轻患者来自单亲家庭。曾经有一位不到20岁的患者，长得白白净净的阳光男孩，很小父母就离婚了。初二时父亲不但不给学费，还到学校把孩子妈妈交的学费要回来。从此，孩子辍学了，“初二辍学，他能去干什么？”至今，孟清都

觉得心痛不已。

王丽医生是今年9月从其它医院调入关爱门诊的，刚接诊时，她说自己快要崩溃了。

几乎每位患者，尽管可能最亲密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是病人，但在这里，他们愿和关爱之家的人分享每一份喜怒哀乐。他们会把找

不到工作的苦恼吐槽出来，也会把病毒控制后生下健康宝宝的照片分享给“家人”，甚至，还会厚着脸皮说最近又和谁“激情”了。

杨丽云更忘不了给他做咨询时的尴尬场景。

“他把当时高危性行为的每一个细节都讲给我听，并让我帮着分析，问题可能出在哪儿了。”至于细节到什么程度，杨丽云只是轻轻摇头笑笑。尽管觉得不堪，但杨丽云明白，如果不是心理压力极大，如果不是对活下去的渴望，人是不会这样咨询的。

据医生们不完全统计，大多数年轻患者来自单亲家庭。曾经有一位不到20岁的患者，长得白白净净的阳光男孩，很小父母就离婚了。初二时父亲不但不给学费，还到学校把孩子妈妈交的学费要回来。从此，孩子辍学了，“初二辍学，他能去干什么？”至今，孟清都

觉得心痛不已。

王丽医生是今年9月从其它医院调入关爱门诊的，刚接诊时，她说自己快要崩溃了。

几乎每位患者，尽管可能最亲密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是病人，但在这里，他们愿和关爱之家的人分享每一份喜怒哀乐。他们会把找

不到工作的苦恼吐槽出来，也会把病毒控制后生下健康宝宝的照片分享给“家人”，甚至，还会厚着脸皮说最近又和谁“激情”了。

杨丽云更忘不了给他做咨询时的尴尬场景。

“他把当时高危性行为的每一个细节都讲给我听，并让我帮着分析，问题可能出在哪儿了。”至于细节到什么程度，杨丽云只是轻轻摇头笑笑。尽管觉得不堪，但杨丽云明白，如果不是心理压力极大，如果不是对活下去的渴望，人是不会这样咨询的。

据医生们不完全统计，大多数年轻患者来自单亲家庭。曾经有一位不到20岁的患者，长得白白净净的阳光男孩，很小父母就离婚了。初二时父亲不但不给学费，还到学校把孩子妈妈交的学费要回来。从此，孩子辍学了，“初二辍学，他能去干什么？”至今，孟清都

觉得心痛不已。

王丽医生是今年9月从其它医院调入关爱门诊的，刚接诊时，她说自己快要崩溃了。

几乎每位患者，尽管可能最亲密的人都不知道他们是病人，但在这里，他们愿和关爱之家的人分享每一份喜怒哀乐。他们会把找

不到工作的苦恼吐槽出来，也会把病毒控制后生下健康宝宝的照片分享给“家人”，甚至，还会厚着脸皮说最近又和谁“激情”了。